

# 基于“信息茧房”理论的意识形态话语权研究

龚莉红<sup>1,2</sup>

(1. 河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江苏南京 211100; 2. 南京财经大学法学院, 江苏南京 210023)

**摘要:**当前人工智能技术日臻成熟,通过“网络算法”推送个人感兴趣的信息形成的“信息茧房”却让受众成为“信息孤岛”的“原住民”,它桎梏了信息的自由流动和传递;导致“沉默的螺旋”不断增大;削弱了“把关人”的作用。计算机通过大数据隐性地给个人匹配相似的信息,并为用户推荐相似的传播方式,这些现象都对主流意识形态具有消解和孤立的作用。个人慢慢会处于自己编织的“信息茧房”困境中,因此,需要主流意识形态的监管者牢牢掌握话语权;转变话语的讲述方式;提高网络信息的供给侧改革;占领网络领域的主战场,防止意识形态领域主体空间的挤压和缩小。

**关键词:**信息茧房;意识形态;话语权;人工智能

**中图分类号:**D693.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4970(2019)05-0035-06

国家对主流意识形态领域应为全方位、全过程、多角度、多层次的掌控,随着计算机“算法”的精准推送,受众越来越多地被推荐具有个人偏好性的新闻和内容。因此,在大众传播的过程中,出现了个人像蚕蛹一样被信息所束缚的情况,他们被裹挟在“信息茧房”中不能自拔,在意识形态领域个人越来越成为“信息孤岛”的“原住民”。“信息茧房”是美国学者桑斯坦在《网络共和国》中提出来的,他认为:“公众只注意自己选择的东西和使自己愉悦的东西。久而久之,会将自身束缚于像蚕茧一般的‘茧房’中”<sup>[1]</sup>。在网络意识形态领域中,“算法”成为全新的“话语霸权”,主流意识形态可能会被悄无

声息地削弱和孤立。国家的意志无法通过互联网平台自由地传递给受众,个人也自动“屏蔽”了国家的主流思想,待在个人的“舒适区”中,这给当前的意识形态工作带来了全新的挑战。

## 一、“信息茧房”对主流意识形态的挑战

随着大数据时代的来临,作为个人阅读受众所产生的数据,随时都可以被收集和分析。作为网络上的用户,浏览痕迹、点击偏好、阅读频率、爱好兴趣、点赞情况、性别、年龄、移动轨迹、消费金额、购物爱好都可以通过计算机分析出来,计算机可以通过大数据给用户“画像”,在“画像”之后,个人的主要

收稿日期:2019-03-01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8VJ005);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18ZD001);江苏省教育厅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2017SJBFDY333)

作者简介:龚莉红(1981—),女,江苏启东人,副研究员,博士研究生,从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

基本情况就会呈现给人工智能,人工智能“巧妙”地给个人推送倾向性的内容,个人也乐于接受类似信息,这种“合谋”就会给主流意识形态带来挑战和危机。

### 1. “信息茧房”桎梏了信息的自由流动

在大数据时代,计算机通过智能算法推荐将以往的“全盘式”推出转化为受众自行“个性化”的选择进而再演化为“选择性”爱好推送。计算机通过智能抓取受众的每一次阅读偏好、阅读时间、点击频率等方式,推演出受众的种族、宗教、年龄、性别、倾向爱好、阅读习惯、购物偏好等,借此推送给他们所感兴趣的内容。长此以往,每个人将像蚕蛹一样将自己束缚在自我偏好的信息城堡之中,无法逾越出自己的偏爱和喜好。

对于互联网传播媒体来说,这是令人振奋的技术手段,提高了受众的黏性,让用户点击或购买自己喜爱的物品,形成一种“沉浸式”的状态。当人们完全投入到信息铸就的高墙中去后会集中注意力,完全过滤掉“杂质”,一个接着一个地点击自己感兴趣的内容。这就解释了为何有人会沉迷于今日头条、抖音、快手、流视频中无法自拔,因为他们接触的都是网络算法不知不觉编织好的“气泡”中,受众陷入了自己结的“信息茧房”中。

对于主流意识形态来说,“信息茧房”是阻碍其传输给所有民众的“过滤器”。桑斯坦在《信息乌托邦》中认为:“如果政治组织的成员——或国家领导人——生活在茧房里,他们就不可能考虑周全,因为他们自己的先入之见将逐渐根深蒂固。一些国家就由于这个原因走向灾难。对于生活在信息茧房里的领导人而言,一个安慰这是这是一个温暖、友好的地方。”<sup>[2]</sup>无论是普通民众,还是领导者如果陷入“信息茧房”的困境,将会导致接收信息的片面、极端和群体极化,甚至会导致负面信息的不断扩大化、消极化和强化。而主流的国家意识形态新闻传达内容可能由于受众的不感兴趣,被计算机算法自动“过滤”、数据被自动“清洗”、内容被自动“忽略”。信息在被个人自我选择之后,日积月累后个体会越来越疏离于主流意识形态,导致信息无法迅速传递到受众中去,在信息的高墙中,妨碍了信息的自由流动和受众的公平接受权。这种话语传播方式导致“去中心化”的语境,个体不但能成为信息发散点,也能成为信息自我选择接收点,使得传播方式呈现出原子

化布朗运动现象,没有规律且无法管控。“信息茧房”是现代化技术带来的社会意识形态方面的隐忧,在传统的国家意识形态所主导的新闻媒体“生产——传播——消费——反馈”活动,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受到了技术方面的挑战。

### 2. “信息茧房”使“沉默的螺旋”不断增大

德国学者诺伊曼认为“一方大声地表明自己的观点,而另一方可能‘吞’下自己的观点,保持沉默,从而进入螺旋循环——优势意见占明显的主导地位,其他的意见从公共图景中完全消失,并‘缄口不言’”<sup>[3]</sup>。在大众传播过程中,基于心理因素的影响,人们总是趋向于从群体的意见中获得支持,避免处于孤立、边缘的状态。因此,当人们的意见和群体中的其他人不相符合的时候,就会选择“沉默”自己的意见。

“沉默的螺旋”在大众传播中,形成一种“意见气候”来影响和制约舆论。根据诺伊曼的观点,在一种意见气候中,如果和“强势意见”相违背,那么必然会被冷落和歧视,而作为社会性动物的人类,由于害怕被孤立和落单,有时候就趋向于“大多数意见”。这也和法国作家勒庞在《乌合之众》中的观点一致,人群总是趋向于“大多数一致性的意见”,在现代传播过程中,“共鸣效果”显得尤为突出。当人民的意见获得大部分人肯定的时候,个人就会大胆地表达自身的观点。这也就解释了“网络大V”“意见领袖”为何能在网络世界呼风唤雨,形成气候,传播观点。当弱势的意见或者观点在公众舆论中越来越“沉默”,这就会让强势的意见得到进一步的社会传播。“在信息技术的‘赋权’下,昔日处于被引导和被支配地位的‘沉默的大多数’、草根阶层在历史上首次成为(或部分成为)了传播的主力”<sup>[4]</sup>。

从理论发展衍进的角度看,“信息茧房”是“沉默的螺旋”的进一步延伸,随着时代的发展,当沉默的意见愈发地陷入失语的境地后,个体就会陷入自己的“舒适区”,陷入“信息的茧房”中不愿意在公共网络领域大胆发声,表达自我的意见和观点。“沉默的螺旋”的理论适用于当时20世纪的社会现象,并对此做出了理论注释,随着互联网的发展,网络社群的产生,“信息茧房”理论是针对“沉默的螺旋”的进一步理论升华,更能针对当前网络意见失声之后,个体意见“内卷”的一种解释。个体不停地接收自己感兴趣的内容,作茧自缚中不断接受类似的信息,

长此以往,就可能形成与自己阅读内容相同的“相似的观点”。一旦受众偏离主流的意识形态观点,可能会在“小众”“亚文化”的群体中越走越远,越走越偏,最后陷入孤立的“小众部落”中,形成自我的“沉默的螺旋”,在自我的小天地中毫无顾忌地发表意见,但是在公众场合却一味地“沉默”下去,无法融入主流的意识形态。这种现象给大众的意识形态传播带来新的挑战,当数据算法掌握到传播的核心权力,那么对国家主流意志的传播是重大的阻碍,国家的主流信息如果通过计算机过滤,将无法深入到受众的移动端,最后会形成受众“沉默的螺旋”现象,受众会沉溺于自己的“小天地”。

### 3. “信息茧房”削弱了“把关人”的作用

“把关人”在很多情况下是“真空”的,传统媒体中新闻信息传播中关键的“把关人”就是记者、播音主持、编导、总编辑,“把关人”在促进社会稳定、引导信息走向、切断不良信息的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库尔特·卢因在《群体生活的渠道》中提出的“守门人”较多是针对传统的,这些“把关人”在传统媒体中是具有一定政治立场、媒介素养的人员,他们对新闻进行筛选,找出符合一定社会规范、政治立场、阶级需求公序良俗的信息进入到受众视野中。这些“把关人”具有一定的筛选权,成为不良信息的阻断器,这也保证了信息的纯洁和接受性。在当今中国社会“把关人”既要坚持党性原则,又要兼顾新闻价值和社会价值,在不违背党性原则的前提下,坚持以满足人民需要作为新闻选择的尺度。

但在“信息茧房”中,计算机的人工智能算法代替了具有更高媒体素养的新闻人的把关,一味推送用户喜好的内容,纵容同质化内容的泛滥,减轻了新闻的社会责任感和舆论导向作用。由于广大普通民众的选择性可能存在素质低下、娱乐化、低俗化的倾向,久而久之用户接受信息的渠道愈发收窄,接收的信息层次愈发低下,可能出现“娱乐至死”“乌合之众”的情况。当“把关人”缺位后,普通个体成为自己的“把关人”,那些新鲜刺激、质量低下、色情暴力的信息就有可能不断被受众点击和接收。因此对主流意识形态来说,那些基于点击量的新闻客户端需要在国家的正确舆论监管下开展业务,任凭计算机“过滤”数据,个人“选择”数据,就可能导致主流意识形态的缺位、被忽视和边缘化。

当编辑把新闻舆论和潜在的意识形态导向权彻

底让渡给“算法”和“人工智能”之后,以往总编辑的权利丧失了。这种趋势对主流意识形态来说是威胁,人工智能虽然模拟了人类的思考但是终究不能模拟人类的情感和思想。通过算法推送的内容减少了人类自身对主流话语的把控程度,削弱了意识形态把控的主导地位。

## 二、防止“信息茧房”,坚持国家掌控话语主导权

人工智能是一把双刃剑,人类获得更方便、便捷的信息的同时也出让了自己独立思考的权利,人们沉溺在轻松、娱乐、肤浅的信息同时忽视了获得知识所要付出的艰苦的思索。正如《娱乐至死》作者波茨曼担心的,人类成为娱乐的附庸,成为娱乐至死的物种。他在书中所说:“人类感到痛苦不是他们用笑声代替了思考,而是他们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笑以及为什么不再思考”<sup>[5]</sup>。在“信息茧房”中,人类让渡出最有价值的思考权,将这个权利交给计算机的“算法”。抖音等娱乐类 APP 甚至让受众丧失了点击的权利,只要通过页面的上下滑动无意识地获得信息。这种“无脑”的娱乐行为不单单导致用户缺乏思考,更让人莫名地被算法“绑架”,被循环往复的视频刷屏进而“洗脑”。

### 1. 削弱“信息茧房”现象,掌控网络平台的话语权

当前,主流的意识形态话语权的争夺无论是在有形的现实世界还是在无形的网络世界都十分激烈,国家主流话语、精英话语、民间话语、网络话语、文化资本话语、宗教话语等不同的话语竞相登场,争夺着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权。众所周知,意识形态领域的绝对主导权是政党在主流话语中最需要掌握的核心权利,也是绝对不能让渡的权利。不能因为短期的科技进步让“信息茧房”成为普通的“舒适圈”,更不能让普通民众沉溺于自我的“茧房”形成亚文化价值观圈子。虽然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意识形态话语体系,毋庸置疑执政党的官方话语体系就应该占据主流的话语体系。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的‘权力’表现为:在当前纷繁复杂的意识形态领域交锋中,马克思主义理论应当发挥着决定性的影响力、凝聚力和支配力,能够从理论、道路、制度和文化等不同层面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提供根本性的思想资源”<sup>[6]</sup>。在不同的国家,意识形态的表达方式各不

相同,但是执政党的官方话语体系显然应该占据话语体系的主流话语。中国当前的意识形态很大一部分都是通过共同话语的构建形成的,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是人民话语的集合和“最大公约数”,也是凝聚中国民众的“黏合剂”,如果由人工智能等方式来“算出”民众的主流话语,那么可能会缺乏解释力、脱离群众、走向分歧。如果受众自我选择进入“信息茧房”,那么就有可能出现主流话语“散、软、弱”的现象。苏联解体时,当时官方的主流思想就已经被西方自由主义思想所取代和掏空。“近代以来意识形态日益显现出两大特点:意识作为新国家制度构架的观念基础而具有先导性;二是作为现代国家的‘软实力’而具有核心性”<sup>[7]</sup>。从话语权安全的角度看,在当今纷繁复杂的语境下充斥着不同话语,但无论话语形式怎么改变,其本质就是话语权的争夺,体现在互联网领域,就是要让主流的国家话语也唱响在网络阵地上。

从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角度来分析,更是需要执政党掌握意识形态的主动权、主导权,在“智能算法”掌控的信息舆论传播阵地中掌握先导权。网络只是一个信息平台的载体,“人工智能”从纯粹技术的角度讲只有中性的色彩,但是网络平台所搭载的内容具有不同政党赋予的意识形态性和政党性,因此掌握“人工智能”的新闻舆论推送表达方式,让主流话语刺破“过滤的气泡”,成为广大人民群众都能接收到的话语,对于捍卫我国的意识形态领域稳固具有巨大的现实意义。

## 2. 防止“信息孤岛”,保障主流意识形态安全

互联网的信息流动是自由的,如今大热的区块链技术和互联网个性化的人工智能技术,其主旨思想就是“去中心化”重“个人体验”。从技术进步的角度讲,计算机算法带给人类的是极大的便利,它减少了人类获得信息的成本,无论是打车软件、物流配送软件、外卖点餐软件、婚恋软件、旅游出行软件都使得信息得到极大的匹配,使得人类生活更为便利。

从技术中性的角度来分析,计算机的智能算法平台是一种技术的进步,但是一旦技术和人类所擅长的思考、兴趣、写作、舆论方式等结合在一起后,就赋予了社会责任和道德义务。人民网连发3条评论认为:“智能平台的身上也应流淌‘道德的血液’,不能只为眼前的流量而放弃了长远”<sup>[8]</sup>。毕竟人工智能模拟的是人类的行为和选择,人是社会性的动物,在社会的道德和法律的规范下行动,因此,不能过分

依赖技术,也不能放松内容的监管。一旦结成了“信息的茧房”,受众就会沉浸于“舒适地带”,形成“温水煮蛙”的效果,在小众的群体中顾影自怜、孤芳自赏,失去了在更大的公共空间中理性接受、全面接收、包容并蓄的特点。

在互联网的治理中,社会建构功能要和新媒体内容聚合平台形成良好的耦合作用。20世纪70年代,法国后现代思想家米歇尔·福柯在《规训与惩罚》对于驯服人体的规训权力的技术运作进行仔细分析,阐释了现代关于人的科学与这种权力的互相依附的关系。福柯在其《话语的秩序》的演讲中首次提出了“话语权理论”,核心内容是:“话语是权力,人通过话语赋予自己权力。”在主流意识形态中,“话语权”是每个统治阶级必然争夺的对象,也是必然维护的权力,在“话语”的产生、传播、收到效果的过程中,需要渗透着某个阶级的价值观,在满足统治阶级的政治诉求、审美倾向、价值观念等需求后,作为社会性的“话语”才能顺畅地在社会上传播,因此“话语权”是“话语”的核心权力,带有天生的阶级烙印。在互联网的治理过程中,不能放弃对国家意志的贯彻和输入,通过计算机“筛选”出的信息带有个人知识储备的烙印,无法代表阶级的政治意图和价值取向,需要加入大量的信息和国家意志,防止个人陷入“信息孤岛”。

## 3. 设置“信息交汇点”,转换官方话语的网络表达方式

在马克思看来,语言不仅仅是用来交流的工具,更是生活实践的产物,在生活中,人们通过交流进行生产、交换、消费,并达成生存。普通民众在获得主流意识形态的方式中,接受官方话语是重要的形式之一。哈贝马斯认为,生活世界理论在他的思想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每个普通受众都生活在日常的生活世界中,需要防止主流意识形态官方话语的高冷化、生僻化、晦涩化,只有当内容的呈现方式是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民众才乐意走出自己的小圈子,融入国家的大话语体系中。

官方话语反映一个国家的意识形态、文化传统和观念态度的变化,反映一个国家所要推行的国家策略和意图。国家作为主流话语的主导者掌握着大众传播的绝对话语权。但是群众自身沉溺其中的“亚文化”“小众文化”具有很强的凝聚力、吸引力、感召力,经常让小部分群体具有强烈的认同感,不同

“信息茧房”之间的人群的语境与思路没有交汇点,导致相互理解的困境,光强调话语权的地位并不能代表其他受众接受话语的内容,更不能代表受众践行话语内容,因此急需转变官方话语权的表达方式。官方话语中权力与地位的并存构成了官方话语传播力的重要维度。但是“强制”性的“灌输”会较少顾及受众话语的接受度,因此对话性空间就会收缩,对话性程度就会更低;“柔性教育”“隐性教育”才能更好地帮助受众冲出“茧房”的束缚。因此通过网络传播适合个体的官方话语,为意识形态传播提供最适合的话语传播途径,同时帮助国家相关部门预判可能出现的意识形态问题。

### 三、应对“信息茧房”现象的网络监管措施

在法律法规和技术技能的双重限制下,如何在科学技术和新闻道德的钢丝绳上达到平衡,这需要平衡计算机“算法”和人工编辑“筛选”的双重标准,从另一种意义上,是平衡科技发展和人文需求的关系,因此,在网络平台上,国家需要通过掌握话语权的方式巩固意识形态领域的安全。

#### 1. 做好“把关人”,掌握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权

当前社会发展过程中,个人接触信息的广度和深入有了较大提高,“信息文明的发展进一步展开了人作为一切社会关系总和的根本性质,社会发展表现为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相互性的真正展开,从而使人的信息需要得到空前发展。信息需要的发展,又意味着人的发展进入一种信息化的良性循环”<sup>[9]</sup>。信息高速流通的目的在于让人更方便快捷地获得信息,而“信息茧房”的现象带来了负面的效果,因此,需要通过主管部门的重视,减少信息的孤岛现象,形成信息共同享用、广泛接入、全面覆盖、传播主流的传播方式。

隔开人们意识形态主动思考的算法被计算机行业称为“过滤气泡”,也是“信息茧房”的另一种称呼。当“过滤气泡”停留在少数个人感兴趣的话题中后,长此以往受众就成为了个人兴趣爱好的“奴隶”。此类“过滤气泡”需要主流的新闻编辑和“把关人”把“过滤气泡”戳破。这一点,主流媒体的新闻资讯类APP就走在了“把关人”和机器推送相结合的良好平衡中。比如人民日报、新华社、光明日报、新华网等官方运营的大型新闻类应用程序都运用了新闻编辑审查人的制度,推送的内容也坚持走

写主流、发好声、把好关的道路,坚持主旋律、资讯类、服务好民生的新闻运营方式。

在一定程度上,抛弃计算机的“算法”给新闻运营和编辑的确带来了成本上的增加,但是这种人工导向性的选择对于机器的技术纠偏就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传播者必须掌握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传播出的内容也必须具有党性和人民性的融合,字里行间包含着对事件叙述的倾向性和阶级性。只有把握住舆论的主阵地,才能让信息茧房中的受众走出“茧房”,走入信息的立交桥,博采众长,走向信息的自由流通和自由获取。

#### 2. 避免“茧房形成”,共建“传受双主体双向再塑”模式

大数据时代,自媒体的广泛应用使得信息的生产、传播、接收仅仅通过网络就可以实现,网络强大的交互性为传播和接受主体的双向性奠定了基础,自媒体轻松实现了传播端和接受端的交流互动。为了避免“信息茧房”的形成,需要在信息发生端和使用端两方面都需要重构和再建。在个体使用端方面,需要重构个体模型,从多角度、多维度、全方位、深层次地“画像”,在群体之间建立对应的群际模型。马克思曾经说过,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通过算法得出的个人“画像”可能是单薄和模糊的。新闻程序设计的过程中,加入更多的维度、更科学的权重去对个人“画像”。同时在新闻客户端维度,需要增加人工新闻审查的力度和水平。尽量删除涉及不正确政治言论、色情、暴力等内容的新闻,更重要的是对一些机器无法审查出来的“擦边球”的新闻进行审核,使得“信息池”的丰富度、内涵性、准确性得到提升,在信息的传播之前就把好出口关。

互联网的传播具有双向性,信息塑造着个人,无数的个人也再造了信息的传播端。在“传受双主体”的传播模式中,再塑信息的流动性和张力,通过“双向再塑”的形式,主流意识形态牢固地掌握意识形态的话语权。计算机通过“算法”寻找海量信息和人的交汇点。在海量的信息与分众化的用户之间,算法为人找所需要的信息,让人最接近信息,但不是桎梏在信息中。在大数据时代,提前研判信息的需求量、分类指导信息的传播方式、精准把握信息的受众人群,合理接受信息的反馈。通过计算机的“算法”细分受众,合理规避千人一面、千篇一律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在大数据时代对信息的传播端

和接收端做好“双向再塑”,有针对性地对信息采集、整理、分析,根据个人的不同个性特点,增强意识形态话语传播的针对性,在“传受双主体双向再塑”的过程中改变以往存在的“大水漫灌”困境。

### 3. 加大信息的供给侧改革

在信息供给和需求的两方面矛盾中,由于广大受众的教育水平、生活经历、文化水平等局限,需求侧即广大受众对低俗的新闻、娱乐化的节目、偏激的观点、奇闻轶事等内容产生兴趣的可能性比较大。这种以需求倒逼供给的情况虽然受到依靠点击量为盈利中心的新闻企业欢迎,但是主流的意识形态网络供给空间无形间就会被挤压、压缩和边缘化。各种意识形态之间的交锋也会更为复杂和不确定。

在大数据时代,信息内容的供给权应该牢牢掌握在国家意识形态监管部门手中,国家需要根据受众的喜好,科学合理地提供具有品味、深度、厚度、宽度的相关网络作品,国家也可以培养“网红”,唱响网络新旋律。供给侧的改革是一种从源头上丰富网络内容、净化网络空间环境的行为。这种国家主流“净网”行动更新了网络管理的理念、增强了监管的效率、展现了国家管理网络的决心和意志。

同时,国家也要加强统一、广泛、集成性的信息化平台建设,消除“信息孤岛”和“数字鸿沟”。从根本上消除闭塞的“信息孤岛”,走向信息的高速公路。

### 4. 提升传播端媒介的素养

当资本的浪潮席卷了大众传播的领地,传播端所提供的信息就兼具了商品性和文化性双重属性。美国著名政治学家哈罗德·拉斯韦尔在《社会传播的结构和功能》概括了大众传播的3个功能:“监视周围环境,联系社会各部分以适应周围环境,一代代传承社会文化”<sup>[10]</sup>。因此,作为内容提供商的新闻客户端、视频提供端等企业,他们传播出的内容都具有一定的文化属性,涵盖了社会的思想、观念、道德、心理、政治、宗教、法律准则等一系列的内容,这些潜在的价值判断就融入了社会意识形态的方方面面。

提高传播端的社会素养是十分重要的环节。在事关国家利益和社会稳定的重大问题上需要对传播媒介和传播主体进行审查和管制,体现出国家对主流意识形态的管理权。同时也要通过教育、培训、管理等方式提高传播主体的媒介素养,让大众传播端的活动和国家的大政方针保持一致,与国家的主流

话语保持同频共振,完成媒体传播公司应尽的社会责任和义务。

在大数据时代,“探讨主流意识形态的领导权建构时,既不可轻视传播技术变革带来的负面影响,又难以简单地通过技术采纳来完全找到趋利避害的对策”<sup>[11]</sup>。每个人都是信息流动的普惠受益者,每个人也都能自由地选择自己感兴趣的内容,受众在各种信息碰撞中找到自身的偏好,但是谨防陷入“信息茧房”而无法自拔。作为新闻媒体企业,需要企业的社会责任感,防止唯“点击量”“阅读量”“收视率”的目标方式,做好信息时代的“守门人”工作。主流意识形态应牢牢掌握在国家媒体管理机构的手中,承担起鲜明的社会责任和社会使命,凝聚全体人民的共识,形成网络意识形态工作的主阵地、主战场。

### 参考文献:

- [1] 桑斯坦. 网络共和国[M]. 黄维明,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6-10.
- [2] 桑斯坦. 信息乌托邦:众人如何生产知识[M]. 毕竟悦,译. 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8.
- [3] 诺依曼. 沉默的螺旋:舆论——我们社会的皮肤[M]. 董璐,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2013:5.
- [4] 赵立兵,熊礼洋. 从“沉默的螺旋”到“意见的长尾”:社会结构变迁与舆论形态重构[J]. 新闻界,2017(6):11-17.
- [5] 波茨曼. 娱乐至死[M]. 章艳,译. 北京:中信出版社,2015:194.
- [6] 梅景辉. 文化自信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当代发展[J]. 马克思主义研究,2017(5):103-112.
- [7] 侯惠勤. 意识形态的变革与话语权[J]. 马克思主义研究,2006(1):46-51.
- [8] 羽生. 人民网三评算法推荐:警惕算法走向创新的反面[EB/OL]. (2017-09-20). <http://opinion.people.com.cn/n1/2017/0920/c1003-29545718.html>.
- [9] 王天恩. 重新理解“发展”的信息文明“钥匙”[J]. 中国社会科学,2018(6):26-49.
- [10] 赛佛林,坦卡德. 传播理论——起源、方法与应用[M]. 郭镇之,译. 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347.
- [11] 张志安,汤敏. 论算法推荐对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影响[J]. 社会科学战线,2018(10):174-182.

(责任编辑:许宇鹏)